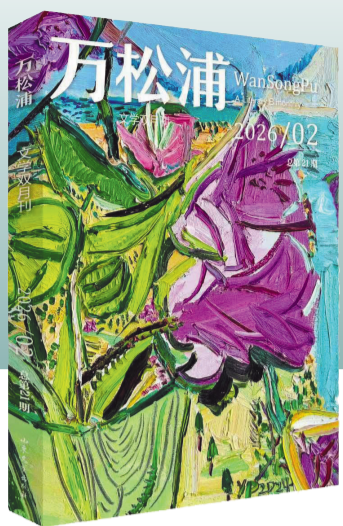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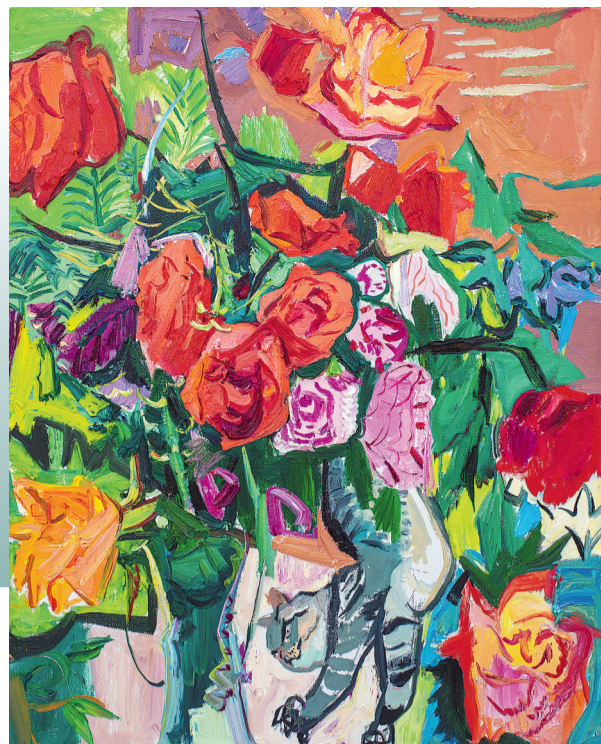


《万松浦》2026年第2期封面画作《猫咪和玫瑰》

闫平作



《报纸拼图》，韩松落著，刊于《万松浦》2026年第2期

小说梗概

2023年秋，辞职后的张南淇参加了一场西部徒步。在酒店走廊，一个叫吴雪钢的男人向他借火点烟。张南淇立刻认出对方——那些年他在报纸上追踪过的法制报道，几乎都出自这位退休警察之手。时光倒回1998年。彼时张南淇在市政公司宣传科工作，靠阅读报纸拼凑出一座城市的隐秘脉络。他尤其痴迷吴雪钢笔下的案件，也由此拼出了这位警察的职业生涯，以及与他搭档多年的女刑警武红的形象。与此同时，张南淇心中一直藏着一根刺：中学同学徐金在下班途中失踪，再无音讯。

十几年后，枯泉案告破。DNA技术锁定了凶手，也找到了徐金的下落。只是此时，报纸早已式微，那些曾承载着凶案、丑闻与人心秘密的纸页，终究成了过往。两个素未谋面的男人在异乡夜色中交换记忆，谈论那些未能见报的细节、被时代碾过的普通人，以及再也回不去的、属于报纸和街头借火的岁月。

创作谈

用报纸拼图，为世界拼图

□韩松落

小时候读到英国作家吉·凯·切斯特顿的《为侦探小说一辩》，其中一段话对我影响至深——“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：我们的后代会拿紫红色的烟帽和色彩瑰丽的山峰媲美，会把路灯柱子看得和树木一样古老、自然”。在他看来，时代的内核不会有变化，或者变化甚小，变的只是材料，而材料也不过是一层色相。所以，侦探犹如王子，公共汽车犹如神船，屋宇犹如城堡，那些楼宇犹如丛林，黑夜星光闪闪，犹如魔怪精灵的眼睛。

在读到这篇文章之前的十九年时间里，我生活在新疆和甘肃的农场、小镇和小城。它们都有明显的半农半牧特征，即便有城市的建制了，但还是在成为城市，且很多时候，它们学得并不那么用心。我从这些地方来到了兰州，开始了解城市，学习在城市生活，并及时地读到这篇文章，它所持的观念就是我的武器。是的，没有什么不同，五星级酒店和大车店没有什么不同，商业综合体和村里的大商店没有什么不同，人和人没有什么不同，由此以及彼。

还是不够，我需要有更多的材料来验证这个观点。本地的都市报满足了需求。从在学校广播站担任播音员开始，到成为单位的宣传干事，成为电视台的新闻播音员，又在媒体黄金时代的尾声，成为时事专栏作者，我每天埋头在报纸堆里，细读报纸，不停“合理地推断”，努力地拼图，以期“成为某个秘密——不论这秘密多么简单——的守护者”（《为侦探小说一辩》）。

《报纸拼图》的故事在那时候开始萌发。它不只是一个故事的结构，也是那时候我生活的结构。“拼图”是故事中的行动逻辑，也是再度描绘这个行动的时候，行文的逻辑。现在看来，我就是在那个时候，重新确认了自己。既然“没有什么不同”，既然一切都是“平行移动”，既然那个秘密是如此简单，那我可以观察一切、接受一切，并和各种事物混战，不论是信息，还是科技。我是在无知无觉中，自愿开始我的“后人”尝试的。

2002年到2011年间，我在几份报纸上开设了名为“晚报新闻”的专栏，重述我看到的新闻，并以我的想象补充新闻背后的细节。其中一篇，就叫《报纸拼图》，讲述的是我如何凭借报纸上的新闻拼凑出一个宣传干事的人生

轨迹。这篇文章发表于2006年。2024年底，我开始把这个想法写成小说，张南淇、吴雪钢、武红逐渐在幽暗中浮现出来。一次借火，一次见面，一夜交谈，王祖贤在太平洋边上的狂奔，在这个版本里都已经有了。最后，这篇小说在2.6万字上收住了。

对于迷信写作速度的我来说，这是非常缓慢的一次写作。给吴越老师看了初稿之后，她提了几个问题，足有1000多字。她认为，现有的故事里，只有报纸拼图、窥见他人的人生这样一个推动力，这是不够的：“张南淇在开头充满了期待，后面这个期待的清晰是因为什么”“它是那种罗列式的，在罗列当中有一种平面的倾向……假如把这些案件呈现某种递进性”……张南淇和吴雪钢虽然见面了，但他们不也可以，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关联，她建议我强化这种关联。我把这段文字复制下来，时不时拿出来看一看。几个月后，我大致想清楚了，再度动手写这个故事。这次，张南淇的同学徐金出现了。徐金的出现，让两条平行线成了吴越老师所说的“H型结构”。徐金成为一个“靶心，是所有无辜受害者的背影、缩影、聚点”。“枯泉连环杀人案”也出现了，并且成为重要的故事线。还有张南淇对徐金故事的重述、悠悠家的聚会等，都是这一版的新内容，“肋骨里的心跳改变了罗列”。就这样写到了6万字，最后发表在《万松浦》2026年第2期。

跨度一年，从2万多字到6万字，但我觉得这个故事还没有写完，我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。所以，下一步，我想把这个故事扩展成一个20万字以内的长篇。但不管怎么改动，有几个核心的因素始终没有变，在长篇里也不会变。

借用悬疑，回避悬疑。悬疑小说和影视剧关系正火热，并且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叙事方式和人物关系。我在写《报纸拼图》的时候，是想回避这种叙事方式和人物关系的。因为我想写的并不是悬疑小说，我只是挪用了

供了一个安全的缓冲地带，让张南淇安全地在一个舞台上彩排，安全地触摸世界；与此同时，也让这个故事变得安全，因为黑夜和凶案都经过了两重过滤。

我也想用张南淇/徐金、张南淇/吴雪钢、吴雪钢/武红这三组人物，形成对照和对应关系。作为行动者的吴雪钢，是张南淇在社会性上的进化版；武红则是徐金的未折损版；吴雪钢和武红，对应着张南淇和徐金，是他们的延伸和完成。而武红的任务，也正如吴越老师所说：“一个把另一个从泥土里挖出来了，给了她正义。”

一夜之间，一个房间。《报纸拼图》的心理时间和故事时间跨越了三十年，但现实时间只有一个晚上。整个故事就在几个小时里完成，甚至是发生在一个空间里的一时、一地。这也是我的一个偏好。我每本小说集里，都会有一个正剧类型的故事，一个舞台剧模式的故事，一个奇幻/玄幻小说。特别是舞台剧模式，是我非常偏爱的，隔段时间就会用舞台剧的结构来写一个故事，严格遵守“三一律”，靠大量的对话来推动。《泰山夜行》里，担当此任的是《浮花》、《晚春情话》里是《晚春情话》。这一次，担当此任的就是《报纸拼图》了。但我又用大量的闪回、溢出，让这个故事看起来不那么像一个“三一律”规范下的舞台剧样式。

这样做也带来了问题。目前看来，当吴雪钢开始真正讲述后，就在形式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、几乎不被有效打断的独白。这在叙事上等同于一次“信息倾泻”。这就导致了张南淇的角色功能发生断裂，他在后半段近乎失语了。尽管在最后，他重述徐金的故事，扳回一局，但那种伪“英雄”故事带来的势均力敌感就不太够了。这就是在扩写成长篇的时候，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。张南淇会有更多的故事，他依然是身弱之人，却因为丰富的经历可以和吴雪钢平等对话。

报纸拼图，真相拼图。三十年时间里，从纸媒时代到网站时代、社交媒体时代，再到人工智能时代，我经历了非常剧烈的社会转型，也经历了“报纸”“网站”和“社交媒体”这一系列媒介的发展。所以，《报纸拼图》必然要有一个双层叙事结构，要有表世界和里世界。表世界里，西部

荒野徒步大会中，两个男人相遇并且对话；里世界中，是跨越二十年的城市暴力史、“枯泉连环杀人案”和媒体变迁史。我想模拟现实写入记忆，并构成认知的过程。它是碎片化的、滞后的、经过主观重构的，但在这重重的改写和重构里，多少有点真实的成分，也多少有点真心在，那是不由人的。人终究是表里如一的，言语落地，就是真的。

观察者是坍塌的行动者。很多悬疑小说，会给警察安排一个热爱破案的民间助手。这个助手担负的是聆听警察的训导和解释，并且适度插科打诨的任务。我很喜欢这个模式，也借用了。但我给了这个助手一些新任务，不是让他成长为一个破案小能手，而是让他负责呈现普通人的无能和无力。张南淇对世界有无限的好奇，也自命为一个行动者。在他的初生牛犊阶段，在某个范围里，他的行动是有效的。但当徐金失踪，他想探查徐金的下落时，却发现自己连第一步都迈不出去，几乎处处受阻。于是，他坍塌成一个观察者，一个焦灼的、忧郁的也是犹豫的观察者，始终不得其门而入。在破案这件事上的受挫，也影响到了他整个人生实现。他在其他的地方也整体坍塌了，都处于一个局外人、观察者的境地，做什么都不可能成功。他最后的微小抗争，是讲述了徐金的故事，但这依然是观察和总结别人的故事，而他自己的故事、自己的叙事，全部消失了。他的故事就是他的消失。所以这个故事里，除了徐金之外，还有一个失踪者，就是张南淇。

关于这篇小说，还有很多想法，就在长篇版里体现吧。也有编辑老师看了这个故事，认为这几个“报社记者”的故事，可能感兴趣的人比较少。有没有人感兴趣这个判断，我不是很在意，我接收到的点是“报社记者”这个命名。因为故事里没有一个真正的记者，从这个命名当中，我意识到，即便是出版传媒业的资深人士，也已经不大了解我曾经从事的工作了。作为行动者和坍塌的观察者，作为从少年到中年，完整经历了过去这三十年的，其实我内心的感受，从来都是：兴尽而归。这也是这篇小说背景音乐的主题，我想通过它努力搭建的氛围。当时觉得苍凉的，现在依然苍凉，在苍凉中，我也大笑了几回，和时代中人照面几回，携手几回。

评点

《报纸拼图》：拼贴似水流年

□王辉城

在中篇小说《报纸拼图》中，韩松落延续着以往的风格与小说美学：多年前的失踪悬案不过是虚晃一枪，他所要描述与重现的并不是破案的过程，而是业已消逝的似水流年。时光缓缓流逝，往日的人和事，皆已如风消散，只顽固地存在于记忆中。旧日曾令人感到温暖与骄傲的行业，亦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，逐渐落寞，荣光不再。

在小说的开端，韩松落便把我们拽进正在流逝的时空中：“又一次辞职”的张南淇在徒步团中偶遇已退休的公安宣传干事吴雪钢。尽管两人过往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接触，但对张南淇而言，吴雪钢无疑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名字。吴雪钢与女同学徐金失踪、枯泉案、刑警队长武红，还有齐秦、王祖贤等构筑了他的人生记忆与生命经验。这些人和事，像是明灭不定的灯光，照亮了他的青年时代。张南淇青年时期的琐碎日常，早已沉淀在时间长河里。唯有这些灯光，愈发明亮，凝固成诗一般的质感，占据张南淇的记忆，最终反过来定义了他的青春。因此，小说的第一节便呈现出强烈的落寞与怅然之感。“又一次辞职”与“已经退休”细节的背后，是世事的沧桑流变。打火机的“一声脆响”，恍惚让人想起“杯子碰到一起，都是梦破碎的声音”的诗句。

张南淇年轻时所处的时代蓬勃发展，万象竞发。自20世纪90年代起，中国社会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。城市在膨胀，人群在肆意流动。放眼过去，处处皆是机会，“爱拼才会赢”是近乎毋庸置疑的信念。所有人都坚信能动性的力量，人的主体性得以充分地发展与呈现。韩松落生于20世纪70年代，其时正处于朝气蓬勃的青年阶段。时代的大潮流与个人的小时代，得以共振，互为注脚。

在多次采访中，韩松落透露出对新闻与报纸行业的向往。他亦曾受益于纸媒，成为知名的专栏作家。张南淇这个人物形象，无疑是作家的夫

子自道。吴雪钢的通讯员写作生涯，是他理想中的生活。张南淇追踪吴雪钢的报道，在各个案件中，拼贴出城市复杂与纷乱的一面。正如评论家何平所言，“如果城市存在A面B面，那么报纸的逸闻轶事则是打开‘这个城市最隐秘的钥匙’”。各种层出不穷的新闻案件——尤其是命案与悬案——构成的社会公共事件，塑造与构建着城市的意识与形象。

对于大部分的“60后”“70后”而言，城市是一个崭新的存在，或者更进一步说，现代化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时代问题。在“乡土中国”里习得的经验与技能，在庞大的现代都市面前，正在逐渐失去效用。用亲缘与人情维系的关系，亦变得脆弱无比。出没在身边的，皆是熟悉的陌生人。个人无法独处，却又被迫独处。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跟上城市扩张的步伐，在时代洪流之中总会有人被无情地抛下。散布各个角落的悬案与命案，便成为城市充满危险的最佳证据与时代的注脚。在我还处于孩童之时，总是能隔三岔五地听村里人谈论城市街头飞车抢劫、出租车杀人狂魔、火车站人贩子拐卖小孩、黑心工厂……诸如此类的恐怖传闻，层出不穷。遥远的城市便顺理成章地成为“吃人般”的存在。然而，及至我们年龄渐长，农田里的产出已然支撑不起家中开支，父母不得不进入城市打工谋生。而这，不只是他们个人的选择，而是一种无法抵抗的时代洪流。尽管内心深处仍然在害怕城市的危险，然而在更迫切的生计问题面前，他们几乎没有更多的选择。

对于悬疑推理小说的读者来说，阅读的乐趣在于挖掘散落在文本的线索与暗语，通过逻辑推理将真相揪出。这种解谜的乐趣，不仅是读者与真相在较量，也是读者与作者在斗智斗勇。韩松落小说中的悬疑成分并不重，焦点并不在于凶手与真相。也就是说，想要在《报纸拼图》中获得解谜乐趣的读者，多半是要失望的。

在韩松落的小说中，案件是隐舍与指向失落的符号与隐喻。失踪者则是一个时代的背影，一个逐渐淡去的符号。他们有的被动失踪，下落不明，最终成为一宗令人无法释怀的悬案；有的则主动隐没，大隐隐于市，黯然望着时代列车轰然而前。无论是主动或被动，都不妨将他们视为被时代洪流抛离之人。尤其是被动失踪者，只是在某个时间或某个地方遇见某些罪犯，便自此下落不明。这种随机与无情，自然可视为是命运残酷的暗影。

在《报纸拼图》中，徐金便是遭遇随机和无情的失踪者。对于张南淇而言，徐金不只是位“有故事”的女同学，更是某些生活想象的投影。她独自一人，身上满是神秘感，与大集体的关系若即若离。在学生时代，她是足球队里唯一的女球员。勤于锻炼，却始终无法上场比赛，让她成为足球队与校园里的“荒谬”与“景观”。而这导致的后果，便是所有群体都不接纳她。只有小树林里的抽烟团，才在不明白不白之中接纳了她。然而抽烟团却

是“松散的‘地下团体’，一哄就散，谁都可以”。无论在哪里，徐金都是匆匆的过客。在徐金短暂的人生中，流言蜚语始终缠绕着她。流言赋予徐金神秘的魅力，同时也遮蔽她真实的人生，仿佛她只是生活中的某个事件，而不是具体的人。其实，徐金的真实人生与大多数人并无本质的区别，甚至要比大多数人更暗淡与复杂些。“她家看似平常，却又不平常”，父亲是玻璃厂工人，母亲则是颇有“神通”的阴阳师。她母亲的职业，注定要被人议论、让人敬而远之的。或许，正是这样的出身，让她不得不疏离人群，将自己“武装”为一名独行侠。

失踪让徐金的人生骤然中断。耐人寻味的是，韩松落紧接着塑造了性格、处境与之类似的武红。一个练体育出身的刑警队长，在男人为主导的警队里工作，她不得不隐藏起女性的部分特性。剪短发、与队员们称兄道弟……这些不就是徐金在足球队、在抽烟团里的翻版吗？队员们同样对武红的真实一面充满好奇与猜测。甚至我们可以说，徐金与武红本质上是同一个人。她们的人生与命运，像是多元宇宙中的分支呈现。张南淇之所以持续关注武红，原因就在于此吧。在他的想象与预期中，徐金理应跟武红一样，有着完整且辉煌的职业生涯。武红多年来用传统的方法来追查“枯泉案”，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线索，却始终无法突破。直到DNA比对技术的成熟，真凶才得以落网，死者身份才得以确认。在新技术面前，拼人力的调查方法，不如“120块钱DNA检测”

有价值、见效快，武红的失落可想而知。她的背影，亦成了“时代的背影”。

三

因而，“时代变了”不仅仅是武红的疑问，也是正在发生的客观事实。办案手法变了，案件的报道、写作逻辑与承载平台都变了。一个案件报道，曾经的记者或通讯员要跑上跑下，不错过任何一个现场，才能完成。而现在的视频博主，只要扒拉些资料，配些轰动的标题与解说，便可算是“深度解读”。更为令人不安的是，AI技术发展后，连扒拉资料的功夫都省略了，可直接一键生成。写作伦理与逻辑，亦早已变了模样。

最为本质的对照，是时间，是时代。当年轰动一时的命案或八卦，成了文本中的公共时间坐标。而某个歌手的演唱会，人物演唱会时的感受，则成为私人的时间坐标。在小说中，张南淇与吴雪钢曾参加过齐秦的同一场演唱会。齐秦的歌声，带给他们相似的感觉：“看年轻时听过的歌手的演出，其实不是听歌，是见面，是告诉对方，自己还活着，还好好，你也老一点，我也老一点，好自相扶携，江湖度余生。”时间会将世间万物祛魅，曾经躁动的青春，曾经的雄心万丈，曾经炽热的爱恨，在时间的抚摸之下，皆成为一股晚风。

